



爱就是火

# 爱，就是火

柳 新

江苏人民出版社

# 爱，就是火

柳·新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4,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7,900 册

---

书号：10100·812 定价：1.00 元

责任编辑 龚·良

## 前 言

《爱，就是火》这本道德与法律纪事文学选集，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编辑出版的。

本书把近年来发表于报章杂志上的反映新的道德风貌、高尚情操的优秀纪事文学，和有关破坏道德的刑事案例、违反道德准则引人深思的真实报告，一正一反，选择其中典型的编辑成册。每篇冠以按语，加以分析，并指出要点或教训之所在。

我们出版此书，企图通过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制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告诉人们，道德，是行为的规范，它既是人们对于是非、好坏、善恶、美丑、荣辱的观念，又是在社会生活中用以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的标准。道德对于人们的思想、品质、作风、情操发生巨大的影响，如在书中《十万元遗产献国家》一文里的女青年杜芸芸，为什么要把应得的巨额遗产无保留地上缴国家？在《大学生的真心与矿工的痴情》一文中，年轻貌美的姑娘郝玉春，既是党员，又是大学生，为何要与“大集体”的矿工史冠民结婚？还有将孤鳏老人“买”回家供养的青工马常元（《马常元买爷爷》），不受“西方自由”金钱美女的诱惑，毅然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上海芭蕾舞团青年演员吴国民（《我旋转的圆心是中国》）

等，是什么力量驱使着、激励着他们这样做？一句话，这是高尚的力量！是社会主义高尚情操与精神文明的力量！道德虽是不成文法，但如若有人违反了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且知过不改，那么，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千夫所指，众口同伐！而一旦触犯刑律，就变成了罪犯，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对于任何人都是铁面无私的。《隆务河的怨愤》一文中的孙小庆、《情种的白日梦》中的周建民，都是从不道德始，而以犯罪终。

这本书，它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是一面照人和照己的镜子；对于道德行为不检点、或者正在向犯罪道路上滑下去的人，它是前车之鉴；而对于那些犯罪分子，则是当头一棒的降魔杵！我们希望，它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编 者

# 鱼水成欢出自然

夏 耘

“在内战时期，熊瑾玠、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六六年写在一份证明材料上的几句话。读着这几句话，人们自然会对熊老和端绶大姐肃然起敬。他们在道德上也是楷模。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模范夫妇并不罕见，但熊、朱这一对却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是俗语所说的“老夫少妻”。一九三三年，他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相继被捕，当时熊老已四十七岁，而端绶二十五岁。图圈中，端绶曾在一首诗里说及他们的年龄问题：

怪哉白发伴青年，鱼水成欢出自然。

世俗不知真心爱，背人嘲笑齿龄颠。

熊老读到端绶的诗后，当即作和：

革命同心不计年，朱颜白发自天然。

新诗不断争供眼，苦里翻为喜欲颠。

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斗争生活，深刻的相互了解和倾慕，使他们成了忘年夫妻，并且经受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且看他

俩在熊老七十岁时合作的一首诗：

五十婆婆七十翁，老来情比少时浓。（端绶句）

诚哉并坐犹嫌远，常在欢腾拥抱中。（瑾玎句）

这对夫妇，自一九二八年结合，征途万里，历尽风涛，直到熊老一九七三年辞世，计四十五个年头。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爱情之花始终鲜艳如新，这首诗就是真实的写照。

熊瑾玎和朱端绶都是湖南长沙人。端绶一九〇八年生，一九二四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一九二五年入党。当时熊老在湖南担任多种职务，并兼任女师校委常委。他虽不是党员，但思想进步，曾参加毛泽东同志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一个已是中年，一个还是少女，地位不同，接触也不多，但相互都对对方有良好印象。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熊老遭反动派通缉，于十月逃亡汉口，并在这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端绶在株洲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也于一九二八年转移到了汉口。从此，二人得以不时过从。同年，他们又先后到了上海。熊老担任党中央的会计，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一商号的名字，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不久，端绶也调到了政治局机关。二人朝夕相处，了解愈深，不知不觉，爱情之神竟跨越了年龄差距和世俗观念的藩篱，来到了他们之间。有一天，熊老问端绶：“你将来理想中的爱人，当是怎样的人？”端绶不作正面回答，却引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几句话，她说：她并不羡慕“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欣赏“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熊老说：“以后且看事实”，并第一次写诗赠端绶：

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

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

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

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当时常来机关的党中央领导同志都称端绶为小妹妹，他们结婚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对端绶开玩笑说，以后不再叫你小妹妹，该称“老板娘”了。于是，“老板娘”便成了端绶的别号。

一九三一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朱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那时在白区工作，探警密布，特务横行，加上叛徒告密，真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危险。果然，不幸的事发生了，对他们的革命信念和爱情忠贞的严峻考验来到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熊老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贺龙同志家属已被逮捕，住处已遭抄搜。熊老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巡捕房的特务捕去，并被打得皮破血流，但他坚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并于当天作诗明志：“漫道此番风味苦，辛酸尝尽见闻多”，表示了非常的坚强、镇静和乐观。熊老被捕后，端绶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端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这一消息，自然使熊老十分不安，他担心端绶年轻，经不起这一严重打击，便作诗以示鼓励：

我已在縲绁，君胡入网罗。

艰难应共任，患难喜同过。

躯壳原无用，精神自不磨。

愿持坚定性，战胜恶妖魔。

其实，端绶当时虽然只有二十五岁，却已久经磨练，相当成熟。在被叛徒指认的紧急时刻，她一面诡称自己叫李惠吾，是熊佑吾（熊老当时用的假名）的表妹，来求表兄找工作的。同时，偷偷地嘱咐同来的人，把有关为熊老请律师的信件等材料转移掉，处理好原来居住的房屋，表现得临危不惧和机智老练。

端绶和丈夫都身陷囹圄，家里还有一个不足三岁和一个才两月的孩子，心情可想而知，但她很坚强。在看守所里，她一面同敌人做种种斗争，一面积极教育争取女看守。有一个姓郑的女看守对她态度很好，端绶便经常托她把信件带出去投邮，再经人转送到熊老手里。于是这一对革命夫妇便写了许多相互关怀，相互鼓舞，洋溢着壮志柔情的唱和诗篇。

端绶被捕不久，就做了一首《捉虱诗》：“铁窗深处锁囚头，夜静更残百感愁。臭虱恼人眠不得，捉它干净不停留。”我曾问端绶大姐：这首诗里的“臭虱”，是纪实还是别有所指？大姐笑了笑说：“当时看守所里虱子也不能说没有，但我诗里的‘臭虱’，其实指的是反动派。诗的用意实际上是表示我要斗争到底的意志，好让党组织和瑾环放心。”大概因为端绶这首诗里有“百感愁”的字样，熊老便和了一首更加乐观的诗：“年将半百老颅头，只识欢娱不识愁。胜利终当归我等，何妨今日小拘留。”谈到熊老的这首诗的时候，端绶大姐严肃而又充满深情地说：“我对革命是忠诚的，但性情比较急躁，有时不免易动感情，而熊老非常豁达沉静，虽一缕千钧，能处之泰然。他的这种品格，使我终生受益。”

由于抓不到熊老的真凭实据，加上各方面的营救，国民党反动派要求把他移交中国当局加以杀害的目的未能得逞，但熊老仍被判了八年徒刑。当时狱中理发很不容易，几个月轮不到一次，后来有一个罪犯理发匠给熊老很好地剃了个头，他不禁感慨系之，并因之写了《整容》一诗。中有句云：“狱里朱颜犹可驻，闺中少妇复何愁”，“八载光阴如一瞬，黄花有色壮深秋。”夫妻爱、战友情，如经纬交织，浑然一体，完全体现了当年端绶所赞赏的“处涸辙而犹欢”的境界。

端绶被关押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出狱后，她写信给熊老，说她决不离开上海，一定要等到熊老刑满，仍能一道工作为止。熊老得到这封信后，十分感动，便挥毫作诗，倾诉衷情：

万苦丛中兴转高，拈毫为汝写情操。

斤斤志与秋霜洁，皎皎心同朗月昭。

八载琴弦虽歇奏，百年鸾凤足逍遥。

一朝之患何须计，共破难关我自豪。

端绶言必行，行必果。她费尽心机，在亚尔培路开设了一家“泰来酒店”，并把她的妹妹朱慧从家乡接了出来，充当助手，真的当起“老板娘”来了。端绶大姐告诉我，这酒店取名“泰来”，也是倾注了自己的感情的。原来熊老曾名“泰儒”，“泰来”就暗含着“泰儒归来”之意。她经常给熊老送书报、食物，还送绒绳衣、棉鞋，针针线线寄深情。熊老收到东西后，也每每写诗回报，把自己的感情倾泻于字里行间，例如在《著端绶制寄棉鞋》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著去温如炙，行来快似骑。从今跨健步，履险直如夷。”熊老平日爱嗑瓜子，而按当时狱规瓜子却在禁送之列，于是端绶“乃去其壳而送其

仁”。这自然使熊老十分感动，他为此写了一首《端绶以瓜子仁见馈感赋》：“瓜子胡为贵，所贵在其仁。破开牙费力，取出手劳神。片片多情意，殷殷最爱心。启封如见面，入口等亲唇。滋味津津好，芬芳阵阵频。难为囚里士，偏苦阇中人。……”

端绶不但营救和殷勤照顾熊老，也经常给关在狱里的贺龙同志的家属向志德、贺学祥等和李士英同志及其他被捕同志送各种物品，并设法加以营救，保释时充当铺保，出狱后照顾生活。当时端绶虽已失去组织关系，她仍然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顾风险，积极为党工作。因此，后来党组织承认了她这一段时间的党龄。

一九三七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同志委派毛泽民同志来探视和营救熊老。饱尝了四年又五个月的铁窗风味以后，熊老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随后，熊瑾玎、朱端绶这对革命夫妻又并肩携手，双双投入了新的斗争洪流。

熊老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六年止，一直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端绶也在报社工作。他们对革命和爱情的双重忠贞，早在同志们中传为佳话。有一年“五四”青年节的集会上，邓颖超同志曾说“熊老板”和“老板娘”堪称模范夫妇。从此，他们的革命模范夫妇的美名就不胫而走了。

最后，我想引用端绶大姐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爱情之火，需要不断增添燃料，才能愈燃愈旺而永不熄灭。而最好的燃料，则是革命的共同理想、共同事业、共同斗争。此外，还得牢记四个字：互敬互让。同时，纯洁真挚的爱情，也将会给共同的斗争增加勇气和力量。”

# 刘和珍的爱情

高 速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高度颂扬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本文根据有关史料，记述了刘和珍的爱情生活，移用殷夫翻译的裴多斐的诗，就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刘和珍烈士，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殒身不恤”的英勇战士，而且是一个正确对待工作、学习和恋爱，把爱情摆在恰当位置的高尚女性。

一九二一年，刘和珍在江西南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一名叫方其道的青年订婚，并且相约，等她大学毕业后才结婚。不久，方其道因得罪权贵，被迫出走外地，而刘和珍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又忙于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所以二人很长时间也难得见上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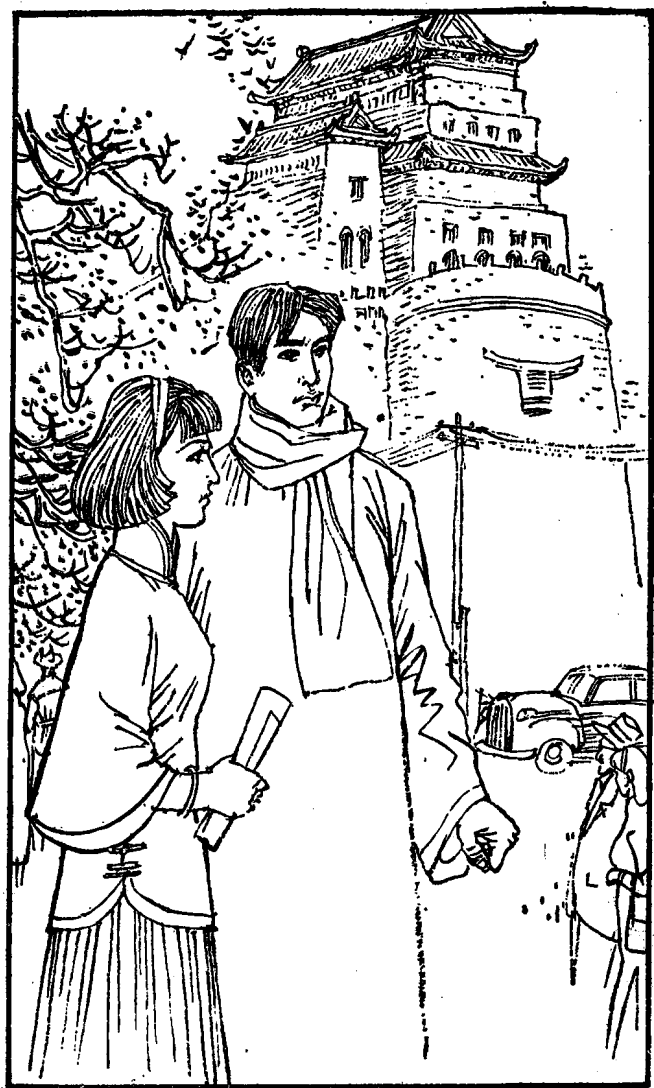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三年秋，刘和珍在方其道等亲友的支持下，到北京考入女子高等师范预科，后升入女师大英语系。一九二五年七月，方其道也到了北京，二人才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但仅仅八个月之后，刘和珍就为祖国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

方其道到北京时，正是女师大为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而爆发的风潮方兴未艾、斗争处于白热化程度之际。担任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刘和珍，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带领同学们与杨荫榆及其后台——军阀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斗争。

八月十九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奉命带领大批军警围攻女师大，对手无寸铁的同学大打出手；刘和珍和同学们不屈不挠，英勇反抗。这天，恰好方其道从校门外经过，刘和珍看见他，马上出来对他说：“校事发生巨变，我们誓不离校，或许把鲜血洒在这里！你赶快离开！”说完就毅然跑进校门继续参加斗争。

女师大被反动当局强行解散后，刘和珍与同学们在党的领导和鲁迅先生的关怀下，又积极投入了复校斗争。不久，在宗帽胡同租定新的校舍。为了筹备开学事宜，刘和珍忙里忙外，任劳任怨。有时方其道来找她，她就把他领到一间房子里，让他帮助做些工作，自己又出去忙碌，甚至几个小时也不回来。有时她打电话把方其道叫来，可是等他到校时，她又去忙别的事情了。只留下纸条，交代好让他办的事情。这时的刘和珍，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为正义事业的胜利而进行的工作中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首都革命”，给反动军阀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十一月三十日，女师大迁回原校址，复校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从此，刘和珍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她常对方其道说：“读书是为实用的，不是骗毕业证书，做装饰品的。”她学习十分勤奋、刻苦。空闲的时候，她也去看方其道，但往往坐



一会儿便走。当方挽留她时，她说：“光阴宝贵，不可虚掷，咱们可不能沉溺在谈情说爱之中，虚度年华啊！”

有一次方其道问她：“你做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不是也耽误学习吗？为什么不摆脱？”她说：“做工作是要牺牲一些学习时间，但是学生自治会关系校务很大，我决不能随便摆脱。”

是的，刘和珍并不是一个埋头读死书的学生，她时刻关心着学校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有一天她对方其道说：“你应当再去加入军队。”“为什么？”方其道不解地问道。因为他以前曾在军队中工作过，正是刘和珍担心他会有生命危险而动员他离开军队的。刘和珍回答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非有枪不可！等毕业后我也到军中服务，和你一道尝尝沙场的滋味！”“可你是师范学校的，应该当教员呀！”“军阀不倒，决无教育，打倒军阀后，我再当教员不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天津，公然派军舰驶进大沽口，炮击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还击。日本帝国主义反而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于十六日提出最后通牒。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刘和珍更是满腔怒火，义愤填膺！

三月十七日晚，刘和珍给方其道打了她生平的最后一次电话：“明天上午我要和同学们到天安门参加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据理驳斥八国最后通牒，并且到执政府请愿，你也一同去吧！”方问：“你的身体怎样？”“有些伤风，还直呕吐，不过没有关系。”“那你就不要去了吧？”“不，我一定要去！明天在天安门见！”

第二天，方其道到达天安门稍迟，没有见到刘和珍。等

到了执政府门口，才远远地看见她正指挥着女师大请愿的队伍，他哪里想到，这遥遥的一面，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刘和珍！

刘和珍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也是一位平凡的女子。她爱自己的未婚夫，爱得纯洁，爱得真挚。但是她从未把这种爱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鲁迅先生说过：“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刘和珍用她的灿烂青春和热血证明：她把对正义和真理的爱，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作人生的最高要义的。而这种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尚的感情啊！

# 两个坚强灵魂的契合

艾 云

被列宁誉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是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又是反对沙俄专制统治的坚强革命家。他的著述《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怎么办》等，早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本文着重介绍了他和妻子患难与共的爱情生活。有道是：

艰难玉成，相濡以沫结爱侣；  
坚贞苦守，心美如画英名扬！

## 一 见 倾 心

一八五三年初的一次晚会上，医生的女儿、二十二岁的黑发姑娘奥尔加认识了当时任俄罗斯萨拉托夫中学青年教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比她大三岁的青年人那深邃的目光，沉稳的姿态，以及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精辟、独到的见解，在奥尔加心灵的荧光屏上激起了感情上的强烈振幅。她，正值妙龄，有着亮晶晶的双眸，动人的面靥和开朗的笑声，再加上她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在诗歌方面表现了一定独到的才华，初次接触，他们在对生活的看法及兴趣爱好上便达到